

二次城市化、土地开发与经济增长

王 平, 肖 文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文章将二次城市化水平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化、二次城市化和城市土地开发的中央计划者模型,在利用 1985—2008 年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模拟分析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当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成本较高时,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率;当落户成本较低时,上述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应保持城乡用地的动态平衡,根据落户成本施行差别化的户籍开放和土地开发政策,让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吸纳人口进城落户的主要场所,这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关城镇化的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二次城市化;土地开发;落户成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1.1;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9-0112-11

一、引 言

(一)现象与问题。改革开放至今,户籍制度虽然没有大的改观,但人口流动已得到默许和认可。我国一直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人口被定义为“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而常住人口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地区半年及以上”为标准进行统计,从而带来了城市化水平虚高的质疑。例如,刘盛和等(2004)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东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76.37%,是本市户籍人口的 3.23 倍,类似东莞的人户分离现象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极为普遍。

在城镇人口规模稳步提升的同时,城市的空间范围也以更快的速度在扩

收稿日期:2011-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03)

作者简介:王 平(1982—),男,陕西西安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肖 文(1952—),女,上海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1981—2008年,虽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6%提高到45.68%,但人均建成区面积也由36.9平方米增加到48.5平方米。城市化进程需要以土地开发作为发展平台,但城市空间的过快扩张降低了城市集聚度,造成资源浪费和耕地保有压力加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针对城市化进程表现出的以上两大特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部分人获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放松城市户籍管制是否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发展阶段(人口落户成本)不同的城市是否应采取差别化的户籍和土地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是否有必要继续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进行大规模城市土地开发来刺激经济增长?

(二)相关研究概述。对本文所提出的上述四个问题,已有研究大多只涉及最后一个,分析了城市化和土地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部分文献关注到了“半城市化”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析城市化和土地开发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大多获得了积极的结论。Henderson(2000)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极高的正相关性,诸多针对中国的研究也肯定了城市化和土地开发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沈坤荣和蒋锐,2007;杜雪君等,2009)。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适宜性问题,国内研究大多得出了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偏低的结论(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俞燕山,2000;张应武,2009),因此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加大土地开发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在理论和政策界获得了广泛支持。另一类文献把城市化水平的虚高现象称为“半城市化”,都认为僵化的户籍管制是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贾若祥和刘毅,2002;李强,2003)。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都是针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顺其自然地推演出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就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没有考虑到城市承载力和拥挤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把“半城市化”现象归结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就为什么要坚持当前的户籍制度给出解释,从而无法从经济发展的利弊角度分析放松户籍管制的效果。最后,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城市土地开发绝对数量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忽视了城市用地和农业用地失衡这一情况。

鉴于此,本文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些新的工作:第一,在最优增长的中央计划者框架下分析城市化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与现有研究强调分散经济和自由选择不同,但符合中国对城市化水平、城市户籍和城市用地规模等关键指标强力控制的现实背景;第二,模型化了中央计划者在推进城市化和控制户籍人口规模之间的两难选择,是对现有研究中政府动机的规范化处理;第三,首次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纳入了中央计划者的“二次城市化”水平这一控制变量,解决了现有文献无法分析将“半城市化”人口转变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完全城市化”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第四,本文对土地开发的处理强调城市用地和耕地的动态平衡,这与国家“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土地政策的基本

思想不谋而合,从城市用地相对规模的视角分析了土地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还比较了在人口落户成本高低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同样政策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给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采取针对性政策提供了借鉴。

二、概念与模型

(一)概念阐述。虽然目前是否拥有城镇户籍已不再是一个人能否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条件,但在绝大多数城市里户籍仍是能否享受很多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先决条件(陶然和曹广忠,2009)。落户成本是指城市为了将一个非户籍人口转换为户籍人口所必须付出的公共产品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教育、文化、医疗、市政建设等公共产品支出均是以城市户籍人口规模为基准进行预算安排的,因此是否选择增加户籍人口规模也是城市政府权衡利弊的结果。

为实现经济增长,中央计划者一方面会通过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吸引人口不断从乡村往城市转移,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为了加速资本积累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也会限制获得城市户籍的人口数量,从而减少公共产品支出成本。以从事生产活动的性质和是否拥有附带城市公共产品的户籍为标准,总人口可以分为农业人口、城镇非户籍人口和城镇户籍人口三类,前两类没有城市户籍,后两类从事非农产品的生产(见图1)。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水平是城镇户籍人口和城镇非户籍人口之和占人口总量的比重,本文将二次城市化水平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把城镇非户籍人口获得城镇户籍的过程称为二次城市化。

中央计划者对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控制使人口能否获得城镇户籍面临不确定性,但公共产品的存在使一个人进入城市能够获得的期望效用高于待在农村。中央计划者也可以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选择高低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量,高水平公共产品虽然能较大幅度提升户籍人口福利,但也会带来较重的财政支出负担,而低水平的公共产品能使中央计划者以较低的支出成本加快城市化进程。

(二)模型构建与求解。考虑一个连续时间的中央计划者最优控制问题。

中央计划者最大化人均期望效用的各期贴现值之和,其目标函数为 $\max U = \int_0^{+\infty} E(u) \exp(-\rho t) dt$, t 表示时间, $E(\cdot)$ 表示期望值, $\exp(-\rho t)$ 表示贴现因子, ρ 表示经济主体的风险规避度。若某个人获得城镇户籍的概率为 $v\lambda$, 则 $v(0 \leq v \leq 1)$ 和 $\lambda(0 \leq \lambda \leq 1)$ 分别是中央计划者控制的

农业人口 P_1	城镇非户籍人口 P_2	城镇户籍人口 P_3
---------------	------------------	-----------------

(一次)城市化水平 = $(P_2 + P_3) / (P_1 + P_2 + P_3)$
二次城市化水平 = $P_3 / (P_2 + P_3)$

图1 两种城市化水平的说明

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为保持偏好的稳定性和简化分析过程,假设所有人都有相同偏好,这样一个人的期望效用可写为:

$$E(u(c_r, c_u)) = v\lambda c_r^\sigma c_u^{1-\sigma} g + (1-v\lambda) c_r^\sigma c_u^{1-\sigma}$$

其中, c_r 和 c_u 分别表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该效用函数表示,一个人能以概率 $v\lambda$ 获得城市户籍,此时他不仅能消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还能享受到与户籍捆绑的一单位外生公共产品 g ($g>1$);同时,面对 $(1-v\lambda)$ 的概率无法获得城镇户籍,他只能消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 $\partial E(\cdot)/\partial v>0$ 表明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个人期望效用。因为公共产品的存在使 $E(u(\cdot))>c_r^\sigma c_u^{1-\sigma}$,即以概率 $v\lambda$ 获得城市户籍的效用要高于一个纯粹的农业人口的效用,所以经济体中的所有人都倾向于成为城市人口,表现出该期望效用函数式的偏好。把经济中人口总量和土地总面积标准化为 1 个单位,则城市人口相对数量为 λ ($0\leq\lambda\leq 1$),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为 μ ($0\leq\mu\leq 1$)。

下面从人均的角度考虑生产技术。假设农产品生产只取决于所使用的土地数量,农产品人均产出可以被简单地写为 $y_r = [(1-\mu)/(1-\lambda)]^\alpha$, α 是人均农地的产出弹性。非农产品人均产出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遵循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 1956)的传统,物质资本依然被认为是决定城市生产率的关键要素之一(Ranis 和 Fei, 1961; Harris 和 Todaro, 1970; Henderson, 2003),这与城市资本劳动比较高的特征相吻合;其次,遵循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很多研究认为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也有重要作用(Henderson, 1974; Fujita 和 Ogawa, 1982; Black 和 Henderson, 1999; Lucas, 2001);最后,除了城市的绝对规模外,城市人口密度对生产率也有重要影响(Ciccone 和 Hall, 1996; Carlino 等, 2007),城市的高密度环境一方面使知识交流和增进变得容易,另一方面因拥挤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基于这些理论,本文将非农产品人均生产函数设置为:

$$y_u = k^\beta \lambda^\eta e^{\frac{\lambda}{\mu} a + b \left(\frac{\lambda}{\mu}\right)^2} \quad (1)$$

其中, k 表示城市人均资本量, e 是自然数, λ/μ 表示城市人口密度, β 和 η 分别是资本和城市规模的产出弹性。该生产函数第一部分 k^β 是资本要素的作用,第二部分 λ^η 是城市规模经济的作用,第三部分则是城市人口密度的综合作用。

最后设定城市人均资本积累规则。如前所述,城市化水平和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非农产品生产和个人期望效用的增加有益,这是中央计划者之所以推进城市化的动机。但另一方面,在维持城市人均享有的公共产品 g 固定不变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人拥有户籍意味着要增加支出,从而削减了物质资本的积累速度,降低了产出增长能力。总产出除了要扣除消费和折旧外,还要减去期望公共支出成本,才能进行资本积累。从中央计划者的角度看,对一个人的期望公共品支出等于 $v\lambda g + (1-v\lambda) \times 0$ 。假设产出的消费和公共支出剩余按 1:1 的比例转换为资本 k , δ 是资本的自然折旧率, $\dot{k}$ 表示资本的变动

量,人均资本积累规则就可以写成:

$$\dot{k} = y_u - c_u + y_r - c_r - \delta k - v\lambda g \quad (2)$$

该最优控制问题的当前值 Hamilton 函数为:

$$H_{\{c_r, c_u, v, \lambda, \mu\}} = v\lambda c_r^\sigma c_u^{1-\sigma} g + (1-v\lambda) c_r^\sigma c_u^{1-\sigma} + \lambda (y_u - c_u + y_r - c_r - \delta k - v\lambda g)$$

中央计划者通过选择消费路径 c_r 和 c_u 、二次城市化水平 v 、城市化水平 λ 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 μ 来影响状态变量 k , 实现最优化目标。 λ 为 Hamilton 乘子, 是状态变量 k 的边际值, 表示 k 改变一个单位所带来的目标函数最优值的变动, 被称为人均资本的影子价格。根据 Pontryagin 极大值原理, 该经济体稳态增长率 γ 的隐函数表达式为:^①

$$\gamma = \frac{\rho + \delta - \gamma}{\beta} + \Omega^{\frac{1}{1-\beta}} \left\{ \left[\frac{\eta \mu^3 + a \mu^2 \lambda + 2b \mu \lambda^2}{a \lambda^2 \mu + 2b \lambda^3} \right]^\alpha - \frac{c_r(0) e^{\gamma t}}{\sigma} - v \lambda g \right\} - \delta \quad (3)$$

其中, $\Omega = \frac{\rho + \delta - \gamma}{\beta \lambda^\gamma e^{\frac{\gamma}{a} + b \left(\frac{\lambda}{\mu} \right)^2}}$, $c_r(0)$ 表示初期的农产品人均消费量。

(三) 参数估计。受城乡人口统计数据的限制, 我们选取 1985—2008 年时间序列数据, 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所用相关指标按如下方式计算:

(1)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人均消费。出于对恩格尔系数含义和计算方式的考虑, 本文按如下方式计算人均消费: 以 1978 年为基期计算《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值, 再用该实际收入与城乡各自的恩格尔系数相乘, 得到城乡实际农产品人均支出, 以此作为农产品人均消费。同时, 以 1 减去恩格尔系数的结果作为非农产品消费权重, 按以上方式计算得到非农产品人均消费。

(2) 城市人均固定资产。鉴于《中国统计年鉴》只从 1995 年开始按城乡划分固定资产投资, 因此本文按如下方式计算: 对统计年鉴给出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按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其实际值。参考 Chow (1993) 估计中国 1952 年非农业部门资本存量为 582.67 亿元, 以此作为基期城市资本存量。对 1995 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我们加总“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以同期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城市比例的一个参照, 两者相乘获得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这样就可以在 1952 年 582.67 亿元资本存量的基础上, 采用 Young (2000) 假定的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 6% 作为城市固定资产折旧率, 按照永续盘存法 (张军等, 2004) 计算得到 1985—1995 年城市固定资产存量的估计值; 以 1995 年得到的估计值为基础, 结合 1995—2008 年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 再利用永续盘存法可以算得 1995—2008 年的城市固定资产存量。用 1985—2008 年的城市固定资产存量除以历年城镇人口

绝对数量就可以得到城市人均资本存量数据。

(3)城市用地相对面积和耕地相对面积。由于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绝对量虽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相对量仍被掌控,本文用相对面积来考量城乡用地情况。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给出的“耕地资源总面积”多年不变,我们用“有效灌溉面积”作为耕地绝对面积的代理变量,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中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城市用地绝对面积的代理变量,以每年两个面积之和作为当年的土地资源总量,再做归一化处理就可以得到城市用地相对面积和耕地相对面积的具体值。

(4)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人均产值。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生产遵循三次产业的划分法则,将第一产业产品作为农产品,第二、三产业产品作为非农产品。具体计算方法为:以 1985 年为基期,分别计算三次产业的历年实际产值,再用第一产业实际产值除以对应年份乡村人口绝对数量得到农产品人均产值,用第二、三产业实际产值之和除以对应年份城镇人口绝对量得到非农产品的人均产值。

(5)城镇和乡村相对人口。直接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城镇和乡村相对人口数量。

用相应数据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人均生产函数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生产技术参数的估计值 $\alpha = 1.5082$ 、 $\beta = 0.2959$ 、 $\eta = 0.7496$ 、 $a = 0.4298$ 、 $b = -0.0243$ 。

风险规避度 ρ 的估值相对麻烦一些,在模型求解过程中可以得到 ρ 与其他变量和参数存在如下均衡关系:

$$\rho = \gamma - \delta + k^{\beta-1} \beta \chi^{\eta} e^{\frac{\chi}{\mu} + b} \left(\frac{\chi}{\mu}\right)^2$$

我们计算得到 1986—2008 年 c_r 、 c_u 和 k 的年均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 0.078,以此作为 γ 的赋值,再把 1986—2008 年 k 、 χ 和 μ 的算术平均值代入上式,结合前文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可以算得 ρ 的一个近似估计值为 0.147。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模拟分析

考虑到城市户籍所附带的公共产品数量差异,即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成本不同,我们在模拟分析中依次让公共产品数量 g 取值 2、6 和 10,分别表示人口落户成本较低、中等和较高三种情况。^②

(一)二次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迫于耕地保护压力能够维持城市用地相对面积的稳定,同时城市化水平又无明显提高,那么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放松城市户籍管制,让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没有城市户籍的人获得户籍,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会给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率带来什么影响? 令 $t=1$, $c_r(0)$ 取 2008 年人均农产品消费额 0.801, μ 取 2008 年

城市相对土地面积 0.0584, χ 取 2008 年城镇相对人口规模 0.4568, 其余参数取前文估计值, 根据 (3) 式可以得到不同落户成本下稳态增长率 γ 和二次城市化水平 v 之间的关系 (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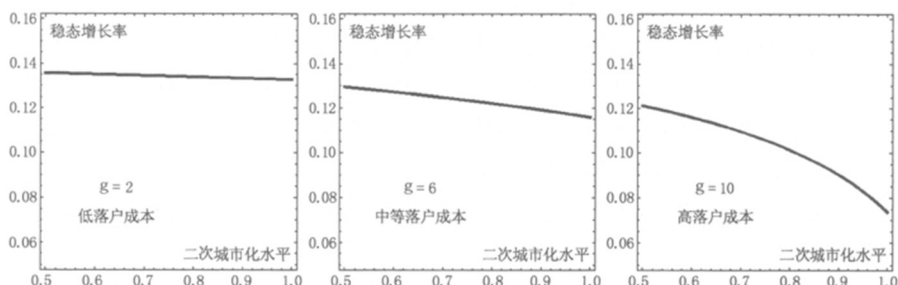


图 2 二次城市化水平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稳态增长率随着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在不同的落户成本下, 稳态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当落户成本较低时, 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稳态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十分微弱; 而当落户成本较高时, 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使稳态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这一结果启示我们在考虑是否放松户籍管制、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时, 要注意落户成本差异的重要作用。对需要支付高落户成本的经济体, 由于公共支出成本的巨大压力, 盲目放松户籍管制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活力, 如果在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的同时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其代价将是降低城市户籍人口享受的公共产品数量。而对只需支付较低落户成本的经济体, 放松户籍管制、让那些被统计为常住人口但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人群获得城市户籍并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因此, 在追求经济最优增长的目标下, 落户成本不同的城市在考虑是否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方面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户籍制度无法做出较大调整, 二次城市化水平保持不变, 同时实行严格的土地政策确保城乡用地面积相对稳定, 那么单纯提高城市化水平会给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率带来何种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③ 我们估算当前中国的二次城市化水平约为 0.767, 其余参数和变量依照前文赋值规则, 根据 (3) 式可以得到不同落户成本下稳态增长率 γ 和城市化水平 χ 之间的关系 (见图 3)。^④

稳态增长率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但在不同的落户成本下, 稳态增长率的上升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当落户成本较低时, 提高城市化水平对稳态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 而当落户成本较高时, 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能使稳态增长率有明显提升。

对需要支付较高落户成本的经济体, 在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会使经济增长率显著提高。但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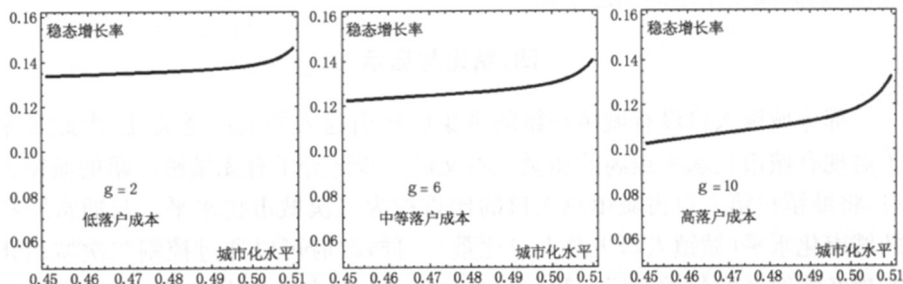


图3 城市化水平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落户成本较低的经济体来说,单纯提高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从我国当前城市化整体水平来看,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城市人口总规模都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有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因而应进一步推进城市化。

(三)土地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人地关系紧张和户籍改革阻力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保持城市化水平和二次城市化水平不变,那么提高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会给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率会带来什么影响?令城市化水平 χ 取值 2008 年的 0.4568,二次城市化水平 ν 取值 0.767,其余参数和变量依前文赋值,根据(3)式可以得到不同落户成本下稳态增长率 γ 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 μ 之间的关系(见图 4)。^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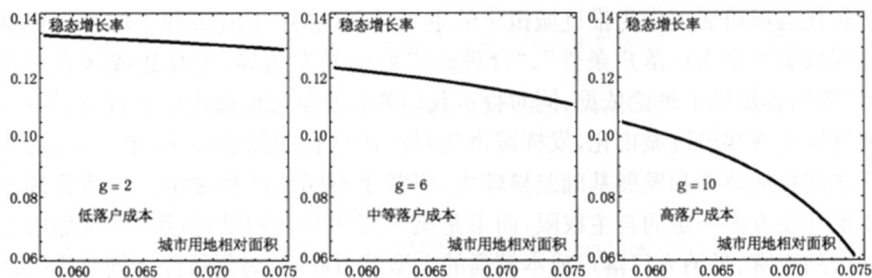


图4 城市用地相对面积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稳态增长率随着城市用地相对面积的增加而下降。但在不同的落户成本下,稳态增长率下降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当落户成本较高时,城市用地相对面积的增加会使稳态增长率显著降低;而当落户成本较低时,稳态增长率受城市用地相对面积的影响并不大。

对需要支付较高落户成本的经济体,在城市人口规模和户籍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用地相对规模的提高会稀释城市人口密度和缩减农业产出,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而对只需支付较低落户成本的经济体,由于公共支出成本低,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从整体上严格控制城市用地

规模,确保城乡用地的动态平衡。

四、结论与启示

部分城镇人口没有城镇户籍的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带来了对现有城市化水平虚高的质疑。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有无城镇户籍的城镇人口,将城镇户籍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称为二次城市化水平。与通常所指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一样,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二次城市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各类目标。我们认为政府之所以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不让所有城镇人口获得城市户籍,是为了以较低的公共支出成本给城市生产活动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加快资本积累发展经济。

本文首次在最优增长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化、二次城市化和城市用地相对规模的宏观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回答了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是否会削弱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发现,城市化对促进经济增长仍有积极作用;当城市吸纳人口落户的成本较高时,提高二次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率;当落户成本较低时,二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用地相对面积的进一步扩张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一个持续推进城市化的经济体来说,其在二次城市化和土地开发等方面的抉择要以吸纳人口落户的成本为依据,才能实现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目标。

上述结论为“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等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提示我们要在政策层面做出以下调整:第一,要继续重视和推进城市化,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因为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差异较大,应赋予不同地区和城市在户籍管理和土地开发方面一定的自主权限,而不是搞一刀切并强制推行;第三,对那些公共产品丰富、吸纳人口落户成本较高的大型城市而言,为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在较高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总的城市人口规模,但不宜放松户籍管制和继续进行大规模土地开发;第四,对那些吸纳人口落户成本较低的城市而言,增加户籍人口和土地开发规模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最适宜放宽落户条件来加快城市化;第五,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用地相对规模已没有进一步增长的必要,因此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和建设用地“增建挂钩”政策,确保城乡用地的动态平衡。

注释:

①限于篇幅,此处未列出求解过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实验发现 g 的低、中、高赋值的跨度选择不会改变模拟结果的变化趋势。

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至 2009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达 1.45 亿。这些流动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城市户籍。2009 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 6.22 亿人,1.45 亿人口约占 6.22 亿人口的 23.3%,即城镇人口中大约只有 76.7%拥有城镇户籍,因此以 76.7%作为我国二次城市化水平的一个估算值。

④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到 2015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提高到 51.5%,所以此处模拟分析中重点考虑了城市化水平从 45%提高到 51%这一阶段。

⑤因为计算得到的 2008 年城市用地相对面积为 0.058,外加严厉的土地管理政策使城市用地相对面积无法大规模增长,所以此处模拟分析将 μ 的取值限制在 $[0.058, 0.075]$ 。

参考文献:

- [1]杜雪君,黄忠华,吴次芳.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9,(1):60—64.
- [2]贾若祥,刘毅.中国半城市化问题初探[J].城市发展研究,2002,(2):19—23.
- [3]刘盛和,陈田,蔡建明.中国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研究重点[J].地理学报,2004,(S1):101—108.
- [4]沈坤荣,蒋锐.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7,(6):9—15.
- [5]陶然,曹广忠.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是两个重要方面——对许玉明观点的回应[J].改革,2009,(4):151—153.
- [6]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9):22—29.
- [7]俞燕山.我国城镇的合理规模及其效率研究[J].经济地理,2000,(2):84—89.
- [8]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 [9]张应武.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中国最优城市规模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9,(5):31—38.
- [10]Bertinelli L, Black D. Urbanization and growth[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4, 56:80—96.
- [11]Black D, Henderson J V.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52—284.
- [12]Carlino G A, Chatterjee S, Hunt R M. Urba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inven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389—419.
- [13]Chow G C.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809—842.
- [14]Ciccone A, Hall R E.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54—70.
- [15]Fujita M, Ogawa H. Multiple equilibria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non-monocentric urban configur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2, 12:161—196.
- [16]Henderson J V. Optimum city size: The external diseconomy ques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373—388.
- [17]Henderson J V. The effects of urban concent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R]. NBER Working Paper No 7503, 2000.
- [18]Henderson J V.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what question

- [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47—71.
- [19]Lucas R E.Externalities and cities[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1,4:245—274.
- [20]Ranis G,Fei J C H.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533—565.
- [21]Solow R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65—94.
- [22]Young A.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R].NBER Working Paper No.7856,2000.

Secondary Urbanization, Lan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ANG Ping, XIAO Wen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level of secondary urbanization as the ratio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to total urba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s a central-planner model including urbanization, secondary urbanization and urban l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85 to 2008, it makes a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ncrease in the urbanization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under high costs of obtaining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secondary urbanization and the relative use areas of urban land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irdly, under low costs of obtaining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abovementioned are not significant. With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China should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l policies concern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penness and l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sts of obtaining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let small-and-medium cities and small towns be the main places to absorb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rbanization proposed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Key words: secondary urbanization; land development; cost of obtaining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许 柏)